

面向他者的生成：德勒兹的“生成一动物”理论探析

张 帆

(东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沈阳 110819)

摘要:“生成一动物”作为德勒兹生成理论的一项具体实践,是德勒兹哲性诗学和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是他反对西方传统的同一性和存在理念的有力工具。它通过物质身体对异质项的感知,生产出人与动物之间的解辖域化倾向,挑战了二元对立的权力机制。从这一角度而言,“生成一动物”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色彩,暗示了由强势群体向弱势他者的政治生成,并成为引领弱势群体体认并反抗权力压迫的方式,呈现出后现代语境中差异化和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为当下的现实政治及文化思考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德勒兹;生成一动物;生成理论;解辖域化;他者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2)05-0062-08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2.05.009

Becoming the Other: An Analysis of Deleuze's "Becoming-Animal"

ZHANG Fan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Abstract: As a specific practice of Deleuze's "becoming", "becoming-animal" is a key concept in his philosophical poetics and literary criticism, and also serves as a powerful tool to oppose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concept of identity and being. It produces a tendency of deterritorialization between human and animal through the perception of heterogeneous terms by the physical body, which challenges the mechanism of binary opposition. From this perspective, "becoming-animal" is endowed with distinct political color, implying the politics of becoming from strong majority to the weak Other, and it has become the way to lead the weak group to recognize and rebel against the power's oppression. Therefore, it presents the value of differenti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in a postmodern context, and also provides th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current political reality and cultural thinking.

Key Words: Deleuze; "becoming-animal"; "becoming"; deterritorialization; the other

自柏拉图以来,整个西方思想史都倚重于对存在与同一的强调,并以此来界定和区分等级制的二元世界。然而,随着新教伦理危机的产生、中产阶级价值观的破裂以及权力政治的出现^[1],后现代的诸多理论家拒斥并质疑了宏

大叙事的同一理念,坚持认为应当以人类解放的名义彻底抛弃启蒙运动的规划,倡导差异政治和微观政治。因此,后现代主义通过对作为现代性基石的启蒙运动及其倡导的理性主义的批判,将“理性及其主体(统一性和完整性的维

作者简介:张帆(1998—),女,山东聊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文艺理论。

持者)在空中化为碎片”^[2],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哲学思想”的反叛。在这场“后现代状况”中,福柯的微观权力分析、德里达的“延异”差异概念、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以及德勒兹的欲望哲学均成为后现代理论的范例,为我们把握当代道德和社会问题提供了参考。

其中,德勒兹在强调差异、重复和内在性的生成(Becoming)理论中,以高度文学化的方式消解了柏拉图式的主张存在和本质的基要主义理念观,使其成为后现代哲思的重要方面。作为生成理论中最典型、最突出的部分,“生成—动物”理论通过人与动物族群间的毗邻和互相解辖域化,建立了处于差异和感知之间的联结。此生成并非某个个体的生成,而是面向他者的生成、面向差异的生成,以及一种透过新问题而产生的生成。从根本上说,“生成—动物”的实践模式消解了“自然/文化、身体/技术、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的哲学观^[3],被赋予了政治操演的力量,成为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实践的理论支撑。正因为“生成—动物”这一理论强大的延展性,自其诞生起,就受到了学术界的瞩目,批评家纷纷撰文讨论,代表性的观点如邵蓓在《如何认识德勒兹的“生成—动物”问题——从德里达的质疑说起》一文中,以回应德里达对“生成—动物”“依然带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质疑为引,通过梳理“生成—动物”理论的架构,呈现出德勒兹异质性、多样性、开放性的哲学思辨^[4];庞红蕊通过并置于克斯屈尔的动物研究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将德勒兹的“生成—动物”理论置于科学与哲学相结合的话语场域,重新定义了人与动物之间“情动的流通”的关系属性^[5];此外,更有学者将“生成—动物”这一哲思理论与阿尔托的“残酷戏剧”进行对比分析,暗示了前者的无政府主义姿态^[6]。但尚有诸多问题需要回答:倘若在某一过程中,只要有“人”与“动物”的参与,或出现情感的流变,就可以称之为“生成—动物”的发生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么在何种(条件化)情况下能够实现这一生成?“生成—动物”又是如何作为一项重要概念参与了后现代语境下的现实政治?鉴于此,本

文以德勒兹的生成理论为对象,对“生成—动物”理论的多重特征和丰富内涵进行深入解析,通过呈现该理论范式在文学叙事中的复杂性,探讨其与当今政治、文化之间的联结,以期展现这一理论独特的实践空间。

一、“生成—动物”的概念纠偏

“生成—动物”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合著《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中,在书中他们指出,传统的文学创作采用了“树状”或“须根”的模式。这就为文本预设了一种根本的、强有力的统一性,使其呈现出秩序俨然、等级分明的特点,相比之下,卡夫卡的创作体系则转向了“块茎”模式^[7]。在生物学意义上,块茎具有多样的形态,可以从各个方向在土壤的浅表层延展,将其置于文学语境下,“块茎”模式为文本建构了多个入口和出口,赋予了作品异质性、多元性和反中心主义的裂变及生成特质,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样态。其中,“生成—动物”这一过程便是“块茎”模式的一个入口,它试图通过动物之变破除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霸权,成为“生成—他者”的重要方式。

在与加塔利一同探讨这种具体的生成之前,德勒兹将大量的哲学研究置于对生成概念的总体理解中。参照其作品的轨迹,可以发现,德勒兹在纯粹哲学领域的生成理论最初集中在《尼采与哲学》一书中。其中,德勒兹就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哲学家对生成的理解作出了精准的评析。以柏拉图为例,他将理念视为绝对的、根本的真实,将感官接触的世界及其表现形式看作理念的摹本或模仿,并指出,拟像在本质上与摹本不同,它复制原型的表象,但是“这仅是一种效果,这种效果产生的基础是拟像与其所(拟)像之物存在内部差异”^[8],换言之,通过拟像及其生成运动,差异成了根本,那些同一的、相似的表象则被降为次要的或者衍生的。因此,柏拉图“理念论”的任务之一就是确立摹本和拟像的区别,并赋予前者以优先性,对后者及其生成过程予以排除。对此,德勒兹指出,正是由于柏拉图对拟像及其生成的敌意,才使得“差异必须从属于同一和相似”^[9],

形成了具有等级性质的世界,然而,不存在位于拟像后面的起源或基础,世界也就不是永远存在或永远同一的,而是生成或重复差异。事实上,德勒兹的这一生成理论延续,也更接近于赫拉克利特所指出的变居不动的生成世界。我们发现,赫拉克利特否定世界的二元论,“否定存在本身”^[10],并将生成作为一种肯定,这与德勒兹将生成视为诸事件构成中差异的内在性的绝对生产或回归,并坚称在生成之流外无外物“存在”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在德勒兹看来,生成是一个解辖域化的生产过程,它从生成和要生成之物的形式、主体、器官或功能出发,从中释放出粒子,并在这些粒子之间建立起动与静、快与慢的关系^{[11]358}——这些处于运动之中的粒子最为接近我们正在生成的事物,也正是通过它们,事物才得以生成。在这个意义上,生成被赋予了“相互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只有当要生成之物本身也生成别的什么事物时,才能实现生成的过程”^{[12]8}。

在生成理论的具体实践中,“生成一动物”便是其中的一种,它引领主客体穿越了规定性和限制性的人/动物间的二元差异,不再局限于以同一为基础的、表象的物种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均在生成的过程中丧失了经验意义上的主客体之别,成为对欲望的宣泄、生命的展开和不可感知阈限的超越。但“生成一动物”这一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误读,背离了德勒兹批评话语的真实意义,因此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概念本身进行分析。

首先,“生成一动物”的要生成之物并不是人们在生活中惯常认知的动物。在《千高原》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定义了三种动物对象。第一种为个体化的动物,它们带有俄狄浦斯或其他情感意义上的特质,由物主代词所修饰,如“我的”猫,常以家庭宠物的身份生活在人类身边,是精神分析关注的对象;第二种为国家或神话意义上的动物,凭借某种特征或属性而承载了形象的能指,如图腾崇拜;第三种为集群的、情动的动物,它们不再是动物之所是或某种象征,而是具有“一个多元体、一种生成、一个种

群”^{[11]338}的行动潜能,这也正是德勒兹理想中的生成对象,在这里,任何动物所拥有的都是一种集群的模式,其繁衍和生殖也不再是遗传性的,而是通过传染、传播或战争这种跨领域的反自然方式得以增殖。

其次,“生成一动物”所关涉的不是主客体间的对立,也不是两个主体间的同一关系,而是一种代表着“僭越”意义的、非表象的生成,一种极限或无限的扩展。它通过接近非人的动物、植物、机器或分子的视角,进一步“生成一不可感知之物”,使得人类“实现这种并非其自身的状态”^{[11]387},借此肯定了人类的局限并得以超越自身或扩展到自身的最高能力,即使像卡夫卡笔下的萨姆沙真的变成大甲虫时,其结果也是关于“人和动物特性的奇特混合”^{[12]156}。正是在生成所构建的广阔范围中,不同等级或领域中的存在物才进入互动中,增强、减少或获得新的力量,而这些存在物之间没有任何的血缘或血统纽带。以德勒兹援引的麦尔维尔笔下的“生成一白鲸”为例,亚哈船长在其生成中彰显了一种对白鲸的强烈迷恋和追逐,他的行动并不是模仿白鲸的状态,抑或是真正变成白鲸,而是在与白鲸接近中被其奇特的性格所即时性地触发、吸引,在感知差异中去“转变自身”,也就是说,亚哈船长的“生成一白鲸”在于以白鲸的方式去行动,却不带着任何的目的或目标意识去改变,因此释放出了分子性的白鲸。这里的白鲸,不再是由克分子的主体、客体或形式决定,它复杂化了任何关于白鲸是何物的感知,因此是一种由主动和被动感知所界定的动物,一种分子动物的集合体。可见,这种生成具有强烈的僭越性:它“既不是亚哈船长的生成,也不是白鲸所代表的普遍性生命的生成”^{[11]335},反而是一种对动物的活动生成的感觉,即当我们是白鲸、狼、狗和甲虫的时候,我们会怎样看待这个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德勒兹看来,僭越性的生成是对生命敞开的键,只有尽可能多样地“变异”或“变化”,通过扩展知觉将“遭遇最大化”,“才能增强我们的生命或权力”^{[12]162}。

最后,“生成一动物”作为一种潜在的解辖

域化运动,是对时间的潜在综合。它“如同一只飞行的箭矢,不再受制于射手的意图为它设定的起始点,也不再受制于靶向标定的弹射点”,因此,“生成—动物”无始也无终,无出发也无到达,而是“在一之间”^{[11]335},我们只能在中间把握它。相应地,所有显在的存在只不过是生成的时间之流中一个短暂的、附带的且多半是错觉的中止。需要指出的是,德勒兹对“生成—动物”命题的阐述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柏格森强调共存的“绵延时间观”,在柏格森看来,时间在本质上呈现出不间断流动的特点,它“像一条无边无际的河流……向着一个无法确定的方向流去”^[13],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将时间看作是一个整体,其中每一个瞬间都与其他瞬间内在相关,在这个意义上,过去的任何瞬间都与现在的瞬间相关联,即过去存在于现在,但以不同于现在存在的方式存在。由于每个瞬间都包含过去的一切,那么,“每个瞬间也就都在自身中重复过去与现在的差异”^[14],同样,德勒兹的“生成—动物”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差异化的运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潜在出发点与现实结果之间只有时间上的差异,潜在之物也就不断通过这种差异来实现自身的现实化,在这里,生成不是为了导向我们希望重复的某种形象或动作,而是没有外在目的的每一个动作的转变之节点,是“处于生成过程中的我们之所是”^{[11]336}。可见,德勒兹借此抛弃了传统哲学中对稳定和同一的追求,转而允许以不确定、游戏性和不稳定的视角来看待事物。

二、解辖域化的生成路径:异常者与感知

通过对“生成—动物”的概念纠偏,我们可以用“异质事物间的动态流变”来概括德勒兹的理论图式,从这一角度而言,人类主体将不再被设想为封闭的、理性的或稳定的个人,而是宇宙万物生成过程中的一个链条或环节,体现了生成理论对二元对立的社会符码的解构。那么,到底该如何实现德勒兹上述所设想的生成实践?笔者认为,这一生成过程需要生成之物的

感知以及要生成之物作为集群异常者的共同参与实现对辖域的解构。

对于要生成之物而言,它应当是集群这个多元体中的“异常的个体”。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异常”并非意味着某种外在于规则或违背规则的“不正常”,而是“与一个多元体相关的某个位置或某个位置的集合”^{[11]343}。因此,这种异常者有着多种角色的可能,它时而呈现为一个集群的首领、指挥者,时而呈现为位于集群旁侧的独居者,甚至可以代表“集群自身的最高的权能”^{[11]343}。以电影《维亚尔》为例,德勒兹曾指出,影片的主人公维亚尔实现了一种“生成—老鼠”,在这一生成过程中,老鼠本(Ben)便是担当了集群领导者的角色;而如前所述,在《白鲸》中,亚哈船长的“生成—白鲸”则避开了集群本身,直接面向作为独居者利维坦而存在的莫比·迪克。在这里,这些异常者与我们先前所划分的情感观念、精神分析视域下的个体化动物无关,也不再像第二种国家或神话意义上的动物一样,具有任何普遍抑或特殊的符号象征,它们拒绝了“种”或“属”的界定方式,标志着一个多元体和辖域的边界,承载了其暂时的或局部的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逾越了这个边界,多元体将会改变其本性。正如亚哈船长曾坦言的,“这头白鲸就是一面墙,紧靠着我。有时候,我想墙外面什么都没有,但这就够了”^[15]。对于亚哈船长来说,白鲸莫比·迪克就是这样一个既非个体也非种类的生成对象,它以“边界—异常者”的身份,代表了不平等、粗野、狂暴和解辖域化的前沿,亚哈正是通过进入与这个异常者的约定或结盟之中,才得以在不断地生成中超越自身生命和存在的特定状态。

此外,生成之物的感知是“生成—动物”的另一重要路径,是实现德勒兹“非人的”思考的关键所在,这种感知基于的不是两者间的类比或联想,而是“在完全差异的个体之间所形成的强度和情动的某种复合”^{[11]363}。首先,我们应当厘清这里的强度和情动指的是什么,二者又是如何形成复合的。德勒兹认为,物质身体不是由形式、器官或功能所界定的,它归属于物质

元素的集合,元素间某些动与静、快与慢的关系即为强度,因此,这种强度与组成、分解或改变个体的身体密切相关,会增强或减弱物质身体的行动力,换言之,强度是任一种身体受到影响的主要方式。而情动,就是根据这些力量的程度,或者说是根据这个程度的极限状况而产生的身体能力上的改变。也就是说,情动就是“通过与外在于它的身体进行接触,变成推动身体前进的持续的、有强度的变化(增加—减少)”^{[11]360}。像这样依据身体与其他身体或其他存在状态形成一种潜在的联合时,会产生另一种生成他者,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更复杂的身体,这也正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所指涉的生成过程,从这一意义上看,“情动就是生成”^{[11]361}。

对此,德勒兹援引了奥地利作家霍夫曼斯塔尔在《钱多斯勋爵的信》中所记叙的在奶窖中投放老鼠药这一事件,钱多斯在信中写道:“当我外出时,这个地窖突然在我体内翻涌,满是老鼠垂死挣扎的场景。刺鼻的毒气在地窖中蔓延,刺耳的哭声在发霉的墙壁上回荡。那些抽搐着的沮丧和绝望在混乱中相互碰撞,当我与老鼠四目相对时,它怒目而视,我在我的体内看到了这只野兽的灵魂向着死亡的命运露出了凶狠的爪牙。”^{[16]123}可以发现,当钱多斯注视着这只老鼠时,正是在他的身上,这只老鼠“对抗着死亡的命运”。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情感不是出于怜悯,更不是同一化的情感,它是一种情感的流变:使得老鼠生成为一种人的思想,而与此同时,人以“一种非人类的情动”生成为垂死的、吱吱叫的、处于痛苦之中的老鼠。虽然老鼠和人完全不是一回事,然而,通过感知带来的强度和情动的复合,二者得以去主体化并一同进入了生成,借由一种(不再由词语所构成的)语言、一种(不再从属于形式的)质料以及一种(不再归属于人的)感受性^{[11]363},形成了一种反自然的共享,瓦解了先前的配置。在这种情况下,生成指向了一个不确定的客观的区域,在此区域中,老鼠与人之间那些共同的、难以分辨的邻近性使得“划定动物和人类之间的界限变得不可

能”^{[11]386}。

值得注意的是,在钱多斯“生成—老鼠”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命令并附加在其身上:要么停止写作,要么像老鼠一样写作。在信的结尾,钱多斯谈到用非英语、非拉丁语或其他非普遍意义上的语言进行写作和思考,用一种“我一个词都不认识”的语言,“一种无声的东西对我讲话”^{[16]128}的语言,这种语言丧失了某种潜藏的人类标准,是对新的感知类型和生成的创造与探索。在这种情形下:老鼠具有了人的“一种狂热的思想”^[17],而人却变成了像老鼠一样写作的作家。这与德勒兹所提出的“作家是一个巫师,写作是一种生成”^{[11]338}的观念不谋而合,这是因为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所承担的并不是动物死亡的事实,而是那些“赋予他一种对于一个未知自然的强烈情感——情动的”^{[11]338}死去的动物,正是这种情动激荡着作家的自我,创造了语言之外的同理心,渗透着各种各样的生成,使得作家可以“生成—老鼠”,“生成—昆虫”,甚至“生成—任何动物”,成为解辖域化的一种方式。

事实上,“生成—动物”通过感知建立的这种人/动物间的新型思考方式,代表了德勒兹对精神分析中欲望观的有力批判。一方面,在德勒兹看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将动物视为一种再现或有待解释的符号,在其通常引证的狼/人案例中,他将病人对狼的欲望追溯到其童年记忆,从俄狄浦斯情结的视角归诸一个原初的对父母的想象,从而回溯到一系列与母系起源相关的丧失、创伤或割裂事件,呈现了令人窒息的三角家庭结构。在这一再现机制中,所有经验的感受都被解读为上述原初场景的能指,病人对狼的生成欲望也就成为了具有起源意义的替代形象,这也正是德勒兹的批判的另一个方面。不同于弗洛伊德的分析,德勒兹指出,狼或者其他动物都不意指任何东西,它是非家族性的、非个体性的狼(或者说是狼群),所拥有的是一种不同于人类的别样的力量。同样,孩童对狼的生成欲望也不是原初创伤(父亲对母亲的占有造成的创伤)的再现,而是因为感知到了

狼的特异性产生的欲望,这种欲望并非引导了主体对客体的占有,而是一种体现差别再现或生成他者的“生产性”^[18]力量,为主体带来解辖域化的可能。由此,要生成之物的异常性与生成之物的感知建立了相互的联结,从而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解辖域化的生成路径。

三、弱势他者的生成:哲思概念与现实政治

如前所示,“生成—动物”通过介于两个群体之间的结盟与解域,提供了一种关于感知和生成的思考方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生成过程常常与社会的边缘群体及其活动有关,它作为逃逸线的关键阈限,穿越了那些限制性、压迫性的等级制度,这也正是德勒兹所主张的“生成—动物”对现实政治的能动性之所在^{[11]348}。由于要生成之物是在非家庭、非宗教也非国家的配置中发展出来的,所代表的是相对于强势中心主义的弱势他者,或者说是被压制的、被禁止的、反叛中的群体,他们始终处于被认可的体制之边缘,为强势群体所支配,因此这种生成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强势—弱势”的生成。在这里,生成破坏了那些组织着我们的身体、经验和历史的二元论,以能动的微观政治参与了对宏观政治的解构。那么,应当如何定义和区分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呢?根据德勒兹的论述,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对二者进行理解。

第一,“强势”和“弱势”不是基于数量来划分的概念,而是一种对于状态或标准的规定^{[11]412}——强势群体代表了掌权和支配的状态,预设了度量的基准,相应地,弱势群体则意味着被统治。按照这种状态或标准,无论是有着最大数量还是最小数量的群体,都可以被归为强势或弱势。以人与动物的关系为例,在传统的哲学思想中,动物始终以相对于人类的“他者”身份存在。一方面,人类常常将某些罪恶的行为归为“像动物一样”,从“动物性”“兽性”的视角对动物进行隐喻维度的污名化,使动物成为支撑人类自我投射的象征系统。另一方面,如同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论断,人类声称动

物缺乏理性的灵魂或自我意志,将动物置于机器、基因技术等暴力之下,通过利用动物来谋求自我与社会的发展,戕害了动物的主体性,形成了严格的物种等级制度。正如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所描述的那样,在欧洲殖民主义者狂热的象牙贸易下,暗含着动物被人类无情剥削的历史以及丑陋的人类中心主义论断。因此,在以“人”为代表的强势群体与“动物”意指的弱势群体之间,强弱的区分不在于人与动物的数量差异,而在于“人”是如何在世界之中建立了一种标准,即人类权力的预设。从这一角度而言,相对于人类标准的动(植)物、男人标准的女性、成人标准的儿童都是弱势他者。

第二,所有的生成都是弱势性的,只能由强势生成弱势这一单向度来运行,这是因为,“只有弱势群体才可以充当生成的能动的媒介”^{[11]413},因此,生成只和二元论中的从属属性形象产生共振。如前所述,弱势他者偏离了强势群体的标准,常常以归属于后者的亚系统身份而存在,那么,生成弱势就是解辖域或偏离标准的过程,就是逃离和超越社会中任何既定界限的过程。由是观之,就“现代欧洲社会和政治权力的主体是成年的、男性的和压倒性的白人而言”^{[11]394},动物、女人以及有色族群都是弱势群体,而“生成—动物”“生成—女人”以及“生成—有色族群”便是通过再现被社会当作“弱势群体”的形象所具有的动作、事件或感受来创造一种分子的或微观的弱势群体。其中,德勒兹突出地强调了“生成—女人”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所有生成的“第一个量子或分子节段”^{[11]395}。这是因为“生成—女人”破坏了男人/女人、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异性恋/同性恋的性别二元论,使男性自明的同一性发生了短路,同时,由于女性处在所有弱势他者中的第一位,也是最基本的受害者,因此,这一生成不受年龄、性别或领域的限制,而是能够穿梭在任何二元机器的关联之中,为想象新的生成模式创造了可能。就此而言,“生成—女人”享有了特权意义,成为超越现有人类社会的、向着政治和未来敞开的方式。

那么,相应的问题也就随之产生:动物、女人或者有色族群本身就作为弱势群体而存在,他们又会生成何物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正是德勒兹对作为生成或生成过程中的“弱势”和作为集合体状态的“弱势群”进行区分的标准,他强调,“人们在一个作为某种状态的弱势群之上作为再结域、或听任自身被再结域;然而,在一种生成之中,人们则是被解域”^{[11]413},也就是说,只有当弱势群体自身被解域、不再是一个根据强势群体而被界定的集合体时,它才可以充当生成的媒介。因此,只存在“作为强势群体的一个被解域的变量的”生成的主体;只存在“作为弱势群体的一个进行解域的变量的”生成的媒介。换言之,在生成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同时性的运动”^{[11]413},强势者从强势群体中分离出来,而弱势者则通过另一种运动,从弱势群体中脱颖而出。从这一角度而言,女人,也要“生成一女人”;有色族群,也要“生成一有色族群”。我们以前者为例,长久以来,传统的女性主义政治敦促女性持续地对抗、谴责和废除二元对立的权力关系,但德勒兹认为,这种对抗只能固化二元关系的格局,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相反,“生成一女人”则为此提供了一份批判性替代方案,它设想了一种分子性的政治活动:把“生成一女人”划入对女性克分子的对抗之中,在它们之下、之间来回穿梭。在这种情况下,“生成一女人”使得女性的粒子进入微观的女性气质区域,产生了一种分子性的女人。相应地,由于女性具有了分子性的特征,呈现出块茎式发展趋势,那么她本身也就成为了无器官的身体,也就不再局限于“女性权利、身体、历史和压迫的主义”,继而得以投入一种“传染性的微观政治运动”,并“浸透和穿越到整个社会领域”^{[11]390}。

由“生成一动物”所表征的“强势—弱势”这一解辖域化过程,其政治维度除了参与女性主义运动和族裔问题之外,在后殖民语境中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向,虽然德勒兹和加塔利并未将大量笔墨置于生成与殖民机制的关联,但他们“确实为思考内部殖民和去殖民这些问题

提供了概念资源”^[19]。将库切于 1999 年发表的文学作品《耻》(Disgrace)作为范例,可以管窥“生成一动物”的政治性与后殖民话语的适配度,小说中的卢里作为生成之物,不断感知到要生成之物——狗的独特生命,在自身情感的转变中,实现了肯定意义上的解辖域化。小说以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卢里在与狗遭遇的过程中,从视动物为“与人类不同层次”的他者,到进入一种以“生成一动物”来建立同伴物种关系的主体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卢里通过“像狗一样”的生成,摆脱了欧洲中心论的具有殖民关系的思维模式,在与残疾小狗建立的情感联盟中,他“更能体恤他者的感情”,不再对物种进行区分,甚至当他目睹屠狗时,“止不住顺着面颊淌下眼泪,他的手不住地颤抖……整个人都被屠狗现场所发生的事牵动着”^[20],此情景成为卢里情感结构中对他人和动物态度的转折点。在这里,这只残疾小狗代表了狗之集群的自身潜能,而狗的死亡,将卢里带入一个不可区分的区域,卢里正是在这一强调非个人化、不确定性生命的区域中“生成一狗”。在小说的结尾,他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身份和个人身份,陪伴着那些流浪狗,“认可了他与动物共同拥有的生命的有限性”^{[21]240},同时,他旁观着女儿和其他人生活的变化,体验着新南非的诞生。可见,卢里的“生成一狗”带来了改变他与自己、与他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可能。从社会的微观政治意义上看,这一过程通过连续性感知的流变,不断背离固守的政治思维模式,具有了抵抗或超越国家机器的力量,从而带领卢里走出政治体制的僵局,它与“生成一非洲人”密切相关,成为“生成一弱势群体”的后殖民政治言说。在这里,“生成一动物”的政治性赋予了文学叙事以解辖域化的力量,有助于实现对权力压迫的反抗和解构,更潜藏了德勒兹所憧憬的积极的、自治性的新型政治主体。

四、结语

尽管德勒兹并没有明确、系统地阐述文学批评理论,但他的大部分著作都“伴随着文学作品的思考,通过与文学文本的遭遇,进而产生和

揭示哲学问题,释放出一种对生命可能性的创造”^{[21]216}。如前所述,德勒兹借由文学叙事的张力,为“生成—动物”这一概念建构了一种独特的伦理内涵和政治意蕴,展现了德勒兹在哲性诗学方面的突破与创造。“生成—动物”通过建立在差异之上的生产性力量,为消解人/动物间的二元对立提供了方案设计,同时更触及了广阔的政治维度,并以“生成—弱势”的方式加以呈现,暗示了一条弱势他者对强势政治解辖域化的潜在路径,折射出德勒兹对哲学理论和社会现实的持续关注 and 长期思考,为当下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价值参考。

参考文献:

- [1] HASSAN I. The culture of postmodernism [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985, 2(3): 119 - 131.
- [2] 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 论现代与后现代的辩证法 [M]. 钦文,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53.
- [3] PARR A. The Deleuze dictionary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21.
- [4] 邵蓓. 如何认识德勒兹的“生成—动物”问题: 从德里达的质疑说起 [J]. 文化研究, 2017(1): 153 - 168.
- [5] 庞红蕊. 于克斯屈尔的动物理论: 从海德格尔到德勒兹和加塔利 [J]. 文化研究, 2017(1): 169 - 187.
- [6] BRUNS G L. Becoming-animal (some simple ways) [J]. New Literary History, 2007, 38(4): 703 - 720.
- [7] DELEUZE G, GUATTARI F. Kafka: towards a minor literature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12.
- [8] 保罗·帕顿. 德勒兹与政治 [M]. 尹晶, 张璟慧, 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8: 66.
- [9] DELEUZE G.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7.
- [10] 吉尔·德勒兹. 尼采与哲学 [M]. 周颖, 刘玉宇, 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 51.
- [11] 吉尔·德勒兹, 菲力克斯·加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 卷 2 [M]. 姜宇辉, 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 [12] 克莱尔·科勒布鲁克. 导读德勒兹 [M]. 廖鸿飞,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
- [13] 柏格森. 形而上学引论 [M]. 刘放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173.
- [14] MAY T. When is a Deleuzian becoming? [J].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2003, 36(2): 139 - 153.
- [15] MELVILLE H. Moby dick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2: 167.
- [16] VON HOFFMANNSTHAL H. The lord chandos letter and other writings [M]. JOEL R, Trans.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Books, 2005.
- [17] LAWLOR L. Following the rats: becoming-animal in Deleuze and Guattari [J]. Sub-stance, 2008, 37(3): 169 - 187.
- [18] DELEUZE G, GUATTARI F.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 New York: Penguin Group Inc., 2009: 126.
- [19] BIGNALL S. Deleuze and the postcolonial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8.
- [20] COETZEE J M. Disgrace [M]. London: Vintage, 1999: 143.
- [21] 保罗·帕顿. 德勒兹概念: 哲学、殖民与政治 [M]. 尹晶, 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8.

(责任编辑: 冯兆娜)